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
名学者传记丛书



张东荪 学术思想评传

左玉河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

左玉河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左玉河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8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戴逸主编)

ISBN 7-5013-1648-1

I. 张… II. 左… III. 张东荪 - 评传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197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名 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
Zhang dongsun Xueshu Sixing Pingzhuan
著者 左玉河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5(千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648-1/B·93

定价 20.00 元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

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

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

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生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

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

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戴逸
导言	(1)
第一章 学术思想的演变	(3)
一 对西方哲学的介绍	(3)
二 创建“新哲学”体系	(37)
三 哲学思想的转变	(48)
第二章 学术交往	(66)
一 张东荪与张尔田	(66)
二 张东荪与张君劢	(73)
三 张东荪与梁漱溟	(82)
四 张东荪与熊十力	(86)
五 张东荪与冯友兰	(94)
六 张东荪与叶青	(98)
第三章 学术思想的渊源	(105)
一 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106)
二 西方哲学对其前期哲学的影响	(112)
三 西方哲学对其后期哲学的影响	(143)
第四章 “多元认识论”为核心的新哲学体系	(158)
一 多元认识论	(158)
二 架构论的宇宙观	(196)
三 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	(206)

四	“文化”的道德观.....	(216)
第五章	文化主义知识论.....	(229)
一	从知识到文化的历程.....	(229)
二	形而上学知识的性质.....	(251)
三	知识的文化制限.....	(261)
四	境况决定与文化满足.....	(274)
结束语:地位及影响		(299)
附录.....		(308)
一	研究张东荪的主要论著.....	(308)
二	张东荪主要文著年表.....	(310)
三	主要参考资料.....	(317)
后记.....		(319)

导　　言

文史哲融于一体，学科分类不明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织一起，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明显特色。然而，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并没有一种叫做“哲学”的学问。“哲学”一词，连带着一套哲学观念及哲学方法，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经过五四时期西方哲学的大规模输入，中国现代哲学开始进入创建阶段，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们对于介绍西方哲学、建立中国现代哲学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活跃于20—4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众多哲学家中，张东荪无疑是非常著名的一位。

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原名万田，浙江钱塘人。1905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哲学，开始冲破传统学术的藩篱，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完成了一个封建士子向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民国初年，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迅速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1917年后，他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新文化运动，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论战，参与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挑起了30年代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同时又致力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建构，成为30年代活跃于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著名人物。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并于战后参加了旧政协会议，提出了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主张，成为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所谓“张东荪

案件”而退出政坛，并离开教席。

作为一位以对西方哲学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著称的中国哲学家，张东荪在广泛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为中国思想界最早贡献了一套按照近代西方哲学模式建构的新哲学体系，成为五四以后建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最早尝试者；作为一位密切关注世界哲学发展趋向的中国哲学家，张东荪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力图打通政治与哲学“两橛”，将哲学思想、文化思想与政治思想融为一体，为中国思想界贡献了一套“文化主义知识论”。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占有大批第一手资料基础上，通过对张东荪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全面考察，通过张东荪与近代中国众多学者的学术交往，弄清张东荪前期哲学向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及特点；通过对张东荪哲学的微观分析和宏观考察，弄清张东荪前后期哲学的不同思想渊源；通过对前期以“多元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和后期“文化主义知识论”的重点阐述，说明张东荪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界定张东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 学术思想的演变

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其活动和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张东荪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哲学方面。张东荪哲学是在介绍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哲学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输入西方哲学到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发展过程。

一 对西方哲学的介绍

与民国哲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同步，张东荪的哲学思想是在介绍和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并逐步成熟的。从晚清到 30 年代，张东荪曾花费巨大精力输入西方文化；而介绍西方哲学，又成为其输入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张东荪无疑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者之一。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称赞道：“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是张东荪先生了。”^① 要弄清张东荪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必须首先考察他介绍西方哲学的情况。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 183 页，北平人文书店，1936 年 8 月版。

(一) 留日时期对西方哲学的最初接触

鸦片战争后，西学重新东来，但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当时中国人在较长时间内，普遍认为西学主要指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练兵、用兵之法，作为西学核心的西方哲学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维新派开始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哲学社会科学。严复在《原强》中说：西方“二百年来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事，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他们已经认识到，西学不仅指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指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当然包括作为思想启蒙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西方哲学就是在此种认识基础上输入的。

有人统计，1904 年以前，西方哲学的输入除了“西学一般”外，尚有四类：一是西方哲学通论，19 篇；二是古代西方哲学，21 篇；三是近代西方哲学，64 篇；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现代西方哲学，147 篇，而近现代西方哲学达 107 篇。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由平等学说，培根、笛卡儿和康德在哲学上提出的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尤为显得醒目和突出^①。此时，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的介绍显然处于开始引进阶段，因此在文献形态上，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很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质的论著却微乎其微；在文章深度上，只是根据国外流行的哲学史书籍进行一般性介绍，难以做到从理论上进行消化。

毫无疑问，无论从介绍的范围还是介绍的深度，当时中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最有贡献者，应该是严复、章太炎、马君武等人。严复主要介绍了英国经验论和归纳法的传播，即洛克的“白板说”、达尔

^① 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第 63—64 页，武汉出版社，1991 年版。

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王国维主要对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进行了较深刻的介绍；马君武主要对黑格尔哲学、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及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穆勒哲学进行了介绍。他们的介绍与此前的梁启超等人相比，有着更高阔的视野和崭新的视角。

张东荪对西方哲学的最初接触和介绍，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张东荪自幼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并曾皈依佛教，对佛学产生过浓厚兴趣。1905年，他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在这里，张东荪接触了西方哲学和近代科学，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深刻影响，开始了一生中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是从他对于传统儒学和佛学思想的怀疑开始的。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开阔了张东荪的视野，使他对西方的学术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06年10月，他与蓝公武等人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从张东荪在《教育》杂志上介绍西方思想的趋向上看，他主要介绍的学说有三方面：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如他与蓝公武合译《物种由来》；二是近代心理学，如他与蓝公武合译《心理学悬念》；三是实用主义和康德的认识论。

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张东荪发表了《心理学悬念》（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并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第2号上，他又发表了用初步掌握的科学知识探讨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真理篇》是张东荪阅读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认识问题的见解后所写的类似读书笔记性质的文章。在该文中，他重点介绍了当时美国以詹姆斯、席勒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初步的理解和介绍。对认识论的许多基本概念，如“主观”、“认知”、“推理”、“思想”、“联想”、“注意”、“想象”、“意及情”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这种情况说明，张东荪从接触西方哲学之始，便敏感地注意到了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对康德的“先天判断”、“悟性”等也有所了解；但更注意的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这是现今发现的

张东荪关于哲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中国人介绍实用主义较早的文章。从此时起，张东荪便接受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自命为一个实用主义的信徒。民国初年，当他闻讯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家詹姆斯逝世的消息时，专门写有一诗，以示对这位哲学家的崇敬：“西风噩信惊残梦，孤烛零篇系吊思。千载是非今日定，百年辛苦几人知。伤心江海苍茫处，刻意人天寂寞时。帝网重重生世泪，中原犹赋大哀诗。”^① 张东荪后来回忆说：“我于宣统年间曾撰有一文，名曰《真理篇》，载友人冯世德蓝公武氏合办的《教育》杂志，现早散失无存了。我自撰那篇文章后，我自命为一个唯用论者。我十余年来时时咀嚼，觉其滋味正如橄榄一样，愈嚼愈有味了。”^②

尽管《教育》杂志仅出2期便停刊，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在留学日本期间，关注的是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在西方科学方面，他尤其关注西方的心理学；在西方哲学方面，他关注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流派，特别是康德和实用主义的认识论。

此时的张东荪，对于西方哲学显然还处于刚刚接触的学习阶段。无论从介绍的广度，还是从介绍的深度上看，都无法与当时介绍西方哲学的王国维、严复等人相比。但接触并介绍西方哲学，对张东荪的思想影响颇大，尤其对于张东荪日后介绍西方哲学和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向有着很大影响。因为他从接触西方哲学之初，便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认识论，并始终对其关注有加。这无疑决定了他日后哲学思考和研究的重心与走向——将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认识论问题上。另外，从张东荪在日本期间介绍西方哲学的活动看，他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主要采取两种方

^① 东荪：《吊美国乾母斯博士》，《民权素》，第4集，1915年1月10日版。

^② 张东荪：《唯用论》，见《新哲学论丛》，第188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